

文史哲研究丛刊

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

文艳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

文艳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 / 文艳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1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8231-0

I. ①白… II. ①文… III. ①白居易(772-846)—
人物研究②白居易(772-846)—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9249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

文艳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惠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字数 348,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8231-0

I · 3107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文艳蓉博士的著作《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即将出版，征序于我，我与文艳蓉有师生之缘，正好借此机会谈谈这部著作的学术贡献与师生切磋之谊。

2005年下半年，我在大阪大学访学，致力于唐代东传的汉籍及日本学者有关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搜集，感受到白居易研究无论是原始典籍还是研究著作，中国与日本都有着巨大的反差，因而将白居易作为重要的专题之一加以集中搜集。但我长期以来从事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全唐诗》以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探讨，对于具体作家，作为专题进行深入研究者主要集中于杜甫和杜牧二人，并没有深入研究白居易的具体计划。

2006年，文艳蓉来到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跟从我研治唐代文学。我们经过多次切磋，决定将白居易的实证研究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选题。我们觉得，白居易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诗人，他不仅转变了当时的文学风气，还深刻影响了日本平安以后的汉文学。有关白居易的研究，已成为20世纪以来的前沿和热点，尽管中国和日本的诸多学者已经做过很多学术价值很高的研究，但进一步开拓的空间仍然很大，不过要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困难也很大。

文艳蓉博士勇往直前，知难而进，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在学术评议中写道：“对白居易之某些重点诗作，如《长恨

歌》、《琵琶行》，有全面、创新探索，尤其是就《琵琶行》诗，结合唐时教坊制度，具体论述长安教坊世俗，对唐时士人社会生活与创作心理极有学术意义的探索。又对白居易诗之四项分类，也有新的论述，有助于对中唐诗歌进展的具体了解。”博士毕业以后，她继续在这一领域锐意开拓。其间得到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的资助，到日本九州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交流访问，与日本唐宋文学专家东英寿、静永健进行合作研究，视野不断拓展，材料不断丰富，境界不断提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正是她辛苦努力的结果。

首先，这部著作以白居易为核心，致力于新史料的发掘。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更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诗人，古今中外已经做过各方面的探讨，因而无论从哪一个层面进行开拓，都非常不易。文艳蓉的著作定位于实证研究，史料的发掘就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她致力于辑集国内的出土文献和东亚的传存文献，结合自唐以来的传世文献，对白居易的家世、婚姻、生平及其诗文版本系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纠正了已有研究的诸多缺失。最突出的方面是对新出墓志和日本文献的挖掘较多。前者如利用新出土的《卢载墓志》，确认白居易诗中的卢子蒙就是卢载，后者如利用日本尚存的《长恨歌序》以推测《长恨歌》撰作时的原生状态。

其次，这部著作通过制度等视角，对于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新的探讨。如结合唐代的教坊制度，论述了长安教坊的世俗特点，证实唐代教坊第一部为胡部，教坊四部为胡部、龟兹部、鼓架部和清乐部，唐代教坊入籍年限为十三岁，进而从音乐层面、社会生活和创作心理等方面对《琵琶行》进行多层面的解读。这种“熟中求生”的做法，表现出作者在学术创新上做出了重要的努力。

再者，对于白居易作品在日本的受容情况，系统整合文献，进行了深度阐发。就文献层面而言，通过域外文献和国内文献的比照，清晰地梳理出传入日本的白居易诗文版本的源流和相互关系。就影响层面而言，从纵向和横向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白居易诗文在

日本的受容方式和不同时期的受容特点。这样的研究,不仅扩充了国内学术界以往研究的范围,也为唐诗在域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信息。

这样的成果,也体现了对学术研究“正”和“实”的追求。就“正”来说,文艳蓉硕士期间师从邱鸣皋教授,入门很正。邱老师也是我本科时的老师,他以为人之正和学问之正闻名于同行和学生之间。我之所以招收文艳蓉为博士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是邱老师的学生。这种“正”的路径,更是贯穿在她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以至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之中。我在与博士生的相互交流中,深切体会到,入门正、路径正的学生,更有学术发展前途,而经常剑走偏锋、别出心裁的研究,尽管能够集中于一时的创新,但或后劲不足,或误入歧途,是不值得提倡的。就“实”来说,我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直提倡实证。实证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实证研究要重视理论基础和文献功力融会,从而达到较高的学理境界。同时需要避免两种偏向:一是将实证研究引入琐屑恒钉的文献考证和文字训诂,二是将实证研究引入技术操作的数据处理和典籍汇编。文艳蓉的这部著作,就是选择了古代经典作家而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成功尝试。

胡可先

2016年8月18日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胡可先
绪论	001
一、学术视角的确定	001
二、研究途径的思考	008
三、研究目标的制订	010
第一章 白居易家世婚姻新证	014
第一节 白居易的先世考辨	014
一、关于白居易先世的纷争	014
二、白居易远祖非胡姓辨	018
三、白居易父母“舅甥婚配说”再辨	026
第二节 白居易的子嗣考辨	029
一、历代白居易嗣子之争	029
二、以侄孙阿新为后辨	031
三、景受即龟郎考	036
第三节 白居易及其家族婚姻考论	038
一、白氏家族与杨氏家族的婚姻	038
二、白氏家族与皇甫氏家族的婚姻	044
三、白氏家族与张氏家族的婚姻	048

四、白氏家族婚姻的特点	050
第二章 白居易交游新考	058
第一节 牛李党争与白氏交游新证	059
一、白居易与牛党人物的交游	059
二、白居易与李党人物的交游	067
三、白居易在牛李党争中的态度	069
第二节 新出墓志与白氏交游发覆	073
一、白居易与卢载交游考	074
二、白居易与卢贞交游考	084
三、申论	092
第三章 白居易诗文版本综考	094
第一节 白居易诗文石本考	094
一、诗歌石本	095
二、文章石本	107
第二节 白居易诗文书迹考	120
一、中国部分	120
二、日本部分	137
三、申论	170
附录：白居易书迹考	173
第三节 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综考	176
一、《白氏文集》大集本	177
二、单行本	182
三、白集选本	190
附录(一)：日本白集主要版本系统图	195
附录(二)：中日主要白集诗文版本图表	195
附录(三)：中日书法名词对照表	200

第四章 《长恨歌》与《琵琶行》新证	202
第一节 论《长恨歌》的序与传	203
一、《长恨歌》的流传	203
二、《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	206
三、《长恨歌传》考辨	213
第二节 《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218
一、《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219
二、“风情”考辨	223
三、《长恨歌》的主题	228
四、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考察	230
第三节 《琵琶行》与唐代教坊乐伎制度	235
一、名署教坊第一部：唐代教坊部类	235
二、十三学得琵琶成：唐代教坊乐籍年限	245
三、自言本是京城女：中唐教坊的变迁	247
第四节 从《琵琶行》看中唐士伎同悲诗	253
一、《琵琶行》与白居易的士伎同悲情怀	254
二、中唐士伎同悲诗考	262
三、中唐士伎同悲诗潮的文化成因与内涵	268
第五章 白居易诗分类原论	275
第一节 白居易讽谕诗原论	276
一、讽谕诗的创作原因	277
二、讽谕诗的原生态作品	282
三、原始讽谕诗的分类	285
第二节 白居易闲适诗原论	298
一、闲适诗的定义解析与原生态作品	298
二、原始闲适诗的思想渊源	300
三、原始闲适诗的文学渊源	310

第三节 白居易感伤诗原论	318
一、感伤诗的心理成因	318
二、感伤诗的原生态再现	324
三、感伤诗的特征与影响	331
第四节 白居易杂律诗原论	334
一、原始杂律诗的复原	334
二、原始杂律诗的内容	336
第五节 白居易诗分类的意义和阙失	339
一、意义：古律之分与情志之辨	339
二、阙失：有始无终与体格混杂	343
 第六章 白居易诗日本受容述论	 348
第一节 白居易诗在日本的受容	349
一、平安时代	349
二、五山时代	359
三、江戸时代	366
第二节 日本白居易诗受容的方式	371
一、诗媒意识	372
二、佳句情结	376
三、选本受容	379
 附录：《白居易集笺校》人物补正	 390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	413
 后记	 432

绪 论

一、学术视角的确定

白居易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以独具一格的诗风卓然屹立于诗坛,开启了中唐以后的一代新风。他的诗不仅在国内享有长久的声誉,而且也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白居易的研究,历朝历代,国内国外,总体上都甚为繁盛,尤其在 20 世纪以后,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但与同为大诗人的李白、杜甫不同,白居易的影响与研究,在海外尤其是日本得到了极佳的机缘,形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线。白居易研究在国内虽称繁盛,但与日本的研究相比,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反差。

就国内白居易研究而言,20 世纪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白居易也被认为是“20 世纪学界研究得最为深透的三大唐代作家之一”^①。目前关于白居易的研究状况,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全面精当的总结,出现了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②。因而笔者在此不拟多费笔墨对 20 世纪以后的白居易研究概况作全面的综述,而是就

① 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94 页。

② 有关 20 世纪以后白居易研究综述方面的著作,有蹇长春《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第 3 期;杜晓勤《元稹白居易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十一章,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李丹、尚永亮《白居易百年研究述论》,载《中州学刊》2006 年第 3 期等等。

学术的层面作纵向宏观的概括。

总体上来看,中国百余年的白居易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这一时期以陈寅恪、岑仲勉的研究成果为代表,是白居易研究的起步期。他们在版本考订、作品笺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尤其是陈寅恪,在白居易的家世、思想与诗歌等方面均提出不少卓见,为之后白居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众多,研究质量不高,很难找出一位标志性的研究人物和一本标志性的著作,我们姑且称为徘徊期。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一阶段白居易被冠以“人民诗人”、“现实主义诗人”之名,学界对其讽谕诗与诗歌理论进行了拔高性的评价,以强求古人的作品迎合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白居易研究看似成为一时的热点,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以至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学界花费不少精力去反思这种狂热背后的导向扭曲。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了诸如顾学颉、霍松林、蹇长春、朱金城等研究专家,这是白居易研究的发展期。一方面反思和矫正前一阶段白居易研究中的偏误,如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再讨论和“新乐府运动”的质疑以及对白居易诗歌及其理论的公允评价的论争,这使得白居易研究逐渐走向正轨。另一方面,白居易的家世、婚姻与生平,以及诗歌思想与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较大程度的深入。最突出的成就是相关文献的整理与

^① 陈寅恪的代表作是《元白诗笺证稿》,本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清华研究院等高校的讲稿,1950年11月始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线装本。该书迄今由多家出版社推出了多种版本。岑仲勉的代表作为《白氏长庆集伪文》,刊于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其研究白氏的著作有多篇。

考证,顾学颉校点的《白居易集》与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的出版^①,为白居易研究提供了通行而又便于利用的集大成版本。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们称之为新变期。基本摆脱了过去受政治思潮影响的倾向,研究的学术化程度得到凸显。这一时期,无论是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涵,还是创作渊源,抑或影响、接受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时出现突破性进展的方面是利用域外资料来解决白居易研究的相关问题,代表性著作是谢思炜的《白居易集综论》和《白居易诗集校注》^②。这一趋向还有着较大的空间。

就日本研究情况而言,二次大战结束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恨歌》研究和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有远藤实夫的《长恨歌研究》(1932)和三条西公正的《古写本长恨歌研究》(1934),后者主要有水野平次《白乐天与日本文学》(1930)、目加田诚《白乐天的讽谕诗——白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考察》(1938)、金子彦二郎《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句题和歌、千载佳句研究篇)》(1943),基本上开创了白居易文本研究与白居易受容研究两个主要领域。战后进入新的研究局面,据《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七卷《〈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索引》统计,战后白居易及其作品研究的著作约80部、论文640篇,白居易受容与影响研究专著约20部、论文约600篇,数量相当可观。具体来说,战后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每个时期都有标志性的成果和代表性的人物。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花房英树、太田次男,在白居易乃至唐代文学研究

^① 顾学颉:《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领域,都是极为响亮的名字,当代的下定雅弘,也堪称不可多得的白居易研究专家。东京大学博士铃木虎雄(1878—1963)是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之一,著有《支那诗论史》等论著多种,其研究白居易的成果主要是《白乐天诗解》。神田喜一郎(1897—1984),早年就读于京都大学,受业于内藤湖南等汉学家,曾任大谷大学、台北帝国大学教授。1945年曾担任《白氏文集》研究会的主席,他的白居易研究成果主要有《读白乐天诗札记》。神田研究白居易的成果虽然不多,但他作为《白氏文集》校注班领导,所著颇有示范意义。此外,他还藏有《白氏文集》平安抄本三、四两卷。花房英树的白居易研究成果有《白氏文集校注》、《白居易研究》、《白氏文集批判研究》、《白乐天》等。太田次男,著有《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研究》,并与神鹰德治、川合康三等合编《白居易研究讲座》(共7册)。这些人物,堪称日本白居易研究过程中不可绕过的里程碑。

其二,注重原典文献的整理和白居易在日本的受容研究。白居易的有关文献,特别是一些原始文献,较早地流传到了日本,而这些文献,有些在中国国内反而因各种原因散佚。日本白居易的研究,非常重视这些原典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如日本所藏的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是迄今传世最早的白居易集子,勉诚社于昭和五十八年(1983)作为重要文化财影印出版,为《白氏文集》的文献研究提供了原典的文本依据和研究的便利。此外,平冈武夫校本《白氏文集》,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昭和四十六年(1971)出版,该书在重视底本的基础上,搜罗了各种异文,详加校勘,代表了日本当时的古籍整理水平。而日本学界的白居易学术研究是从受容研究正式开始的,然后才慢慢扩大到对白居易的本体研究。此后,白居易受容研究一直十分繁盛,并与本体研究平分秋色。从日本平安时代、五山时代到江户时代白居易的受容,学术界都有相关的研究,尤其对早期的平安时代非常重视,有《平安朝传来的白氏

文集与三迹研究》、《平安时代文学与白居易研究》等重要研究著作。从研究内容来说,学者们对日本历代和、汉文学具体作品中白居易的受容基本都有专门论文进行探讨,体现出日本汉学研究细腻而深入的特点。

其三,专门研究刊物的创办和系列研究的实施。20 世纪后期到新世纪之初,白居易研究在日本一直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而且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系列研究的实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白居易研究讲座》的编撰和出版。该讲座共分七卷,从 1993 年至 1998 年由勉诚社连续出版,分专题对过去的白居易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第一、二卷主要是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研究,第三、四、五卷以白居易在日本的受容研究为主,第五卷中《白居易受容围绕诸问题》专题刊登有中国、韩国、美国等各国研究现状的综述论文,第六卷是白集版本研究论文专题。第七卷则刊登了下定弘雅的《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和新闻一美的《白居易对日本文学影响研究》,前者分文集校勘、诗歌、散文、思想、传记生活、译注、白诗渊源、影响研究等八个专题全面总结日本战后白居易研究概况,后者以史为纲概述白居易对日本历代文学家及其作品的影响研究情况。二是系统规范化的倾向,在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和川合康三等学者的带动下,《白居易研究年报》于 2000 年创刊,年报将每年重要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刊登出来,这使得白居易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而且年报经常刊登中日韩学者的相关论文及相关研究现状的文章,促进了白居易研究的国际化。这种宽阔的视野将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由此可见,尽管在 20 世纪后期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的白居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无论在文献积累,还是研究的系统化、国际化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学界是走在中国前面的。从中日白居易研究相互交流来看,中国对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反应也远远比对方慢得多。如 1957 年敬文社出版的堤留吉《白乐天生活

与文学》，以兼济、漂泊、仕官、外任、退休五个阶段对白居易的一生进行了传记式的介绍，并附有《白乐天略年谱》。本书除借鉴了铃木虎雄《白乐天诗解》等日本著作外，还参考了王拾遗的《白居易研究》和苏仲翔的《白居易传论》，这两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时间都是1955年，由此可见日本学界搜集中国研究成果的迅速，而此时中国对日本白居易的研究状况却几乎一无所知。当然，这是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时代造成的。时至今日，域外汉籍研究已深受学界重视，日本白居易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渐渐输入国内，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两国的学术交流空间仍然有限，以及中国学者对日本语言和民族文化背景的陌生等障碍，多数研究成果仍无法被国内学者自如地利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因此，有关白居易研究，从选题来看，尽管是唐代单个诗人的具体研究，但研究视野则必须是国际化的，也只有如此，才能具有新的重要创获。视角之外，笔者最为重视的是两个方面：其一，利用日本的一些原典文献，以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之上。利用日本版本及其研究成果，谢思炜的《白居易诗集校注》已成为集大成之作，通过它以及严绍璁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白居易部分，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日本白集版本的复杂性。其实，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日本白集版本远比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要复杂得多。而日本学界颇致力于此，他们试图对每一种出现或曾经出现过的白集版本从文字校勘、训点注释等诸方面对其源流进行耐心细致的考证，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是我们研究白居易得以凭借的重要资源。其二，借鉴日本白居易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新中国建立之时，日本研究也曾受到中国学界的强大影响，如以白居易为人民诗人、现实主义诗人，对白居易讽谕诗的诗歌理论高度评价的狂热，对《长恨歌》主题究竟为讽谕还是爱情也进行了长久的论争。但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就逐渐冷静下来，摆脱中国学界的影响，转入对白居易各方面的研究，并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即以白居易

作为一个立体的人去全方位地研究,前半生与后半生的精神生活与思想状态都加以重视,也最终形成了“以小见大”的独特研究方法,即抓住白居易作品中的一些细微之处深挖下去,以发掘诗人深层的心理特点及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内涵。如冈田充博的《诗魔与闲吟》从诗魔、闲吟、诗债等概念探讨了白居易从讽谕诗向闲适诗转向的过程,认为诗魔、诗狂等都是在独善理念支配下产生的,既表现了白居易对闲适世界的沉溺,又表明了其后半生明哲保身的处世立场和态度。闲吟表现他企图摆脱苦境、求道入闲的心态,也是他沉醉于独善和闲适世界的表现。

但是,日本白居易研究也呈现出某些不足,如一些汉学研究者因民族心理、文化特征差异等原因而造成对白居易作品的误读,以及过分关注白居易的微观方面研究而略显琐碎等等。我们要克服其不足,使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首要的方面还是要立足我们的本土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运用他山之石时,也不能丢弃自己的主体。日本与中国虽然同属东方,有一定的文化渊源,但在民族特征、文化内涵方面亦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亦步亦趋,就会容易失去自己的研究个性。我们在发掘有关白居易原典文献的同时,也应对唐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考察,以厘清白居易诗文赖以产生的典型环境和原生状态。其次,20世纪以后,中国大量出土文献的公布,也为白居易乃至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师胡可先先生指出新出土文献的运用将会扩大唐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并总结出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一、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二、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三、有助于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与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①的确如此,新出土文献在唐代文学研

^① 胡可先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第47—59页。